

张之洞入枢与丁未朝局*

张建斌

〔摘要〕光绪三十三年，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爆发激烈政争，慈禧太后借机调整朝局，调张之洞、袁世凯入军机处，此举基本奠定了清朝统治最后几年的政治格局。张之洞入枢的动因，时人及后世学者多认为是出于慈禧制衡袁世凯起见，但事实上内情复杂，与当时满汉矛盾的激化、国步艰危的朝政有着密切关联。有关此事的台前幕后不乏风闻，折射出光宣之际的政治网络与权力运作的复杂样貌。在各方寄望瞩目之下，张之洞反而对入京觐见游移观望，满汉矛盾、派系纷争、新政分歧、地方事务、京内起居均为其考量因素。结果如其所料，初入枢垣，虽竭力周旋，却难以平衡朝局，终陷入窘境。

〔关键词〕张之洞 丁未政潮 端方 光宣政局

〔中图分类号〕K25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23)05-0123-12

光绪三十三年（1907，农历丁未年），对于清廷而言是多事之秋，丁未政争引发的人事更替、官制改革带来的部门裁并，让本来就人心惶惶的满汉官员前途未卜，不免惶恐躁动。安徽巡抚恩铭被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满汉矛盾剧烈呈现，内政局势变得更为严峻。大学士、湖广总督张之洞此时内召入枢，被时人关注并寄予缓解统治危局的期许。有关此事，各种记述与过往研究多认为，此举为慈禧太后牵制权臣袁世凯以平衡枢垣的重要举措。^①揆诸史实，张之洞实现了多年期望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上半叶清朝的边疆与边政研究”（项目号22&ZD23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诸位师友和匿名审稿专家的中肯建议。

作者简介：张建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101

① 李细珠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档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见氏著：《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97—303页。马忠文对张之洞入枢后的朝局有所发议，见氏著：《丁未政潮后梁鼎芬参劾奕劻、袁世凯史实考订》，《历史教学》2014年第20期。胡思敬著《国闻备乘》记有“孝钦驾馭庆邸”一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1—112页），代表了时人对张、袁入枢的看法；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所记《袁世凯罢黜始末》（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09页），为笔记中有关此案的代表性著述。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点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探微张之洞入枢前后史事，以期对丁未政潮与清末政局研究有所推进。

入枢的心志，但赴京前面对复杂的政局，行事迁延，显得颇为游移，其内召动因、幕后运作、入京过程以及朝局废衍均有进一步探讨空间，借此可以窥探清廷最后几年的人际网络与政治走向。

一、内召的直接动因与风闻

入阁拜相、官居首辅为张之洞的心志所在，他曾于光绪二十九年春调京，恩礼有加，“上赏冰（张之洞）独席，命御前太监行酒礼，甚优渥”，在京期间参与阅卷，“慈特派硃笔添写七人之上，一切均命冰主持，复命日独冰召见”。^①不过，各方对于张之洞内用态度迥然，“诸公意见不同，迟迟未定，止老（瞿鸿禨）则拉之甚力”^②，“拟令入辅，卒为项城（袁世凯）所挤，竟以私交某协揆代之”^③。未进中垣，张之洞郁郁不得志，曾多次诉说以入京供职为苦，但从未放弃再入枢府的夙愿。

此后，张之洞面对“南洋权限，已为本初（袁世凯）包举”的局面，以“应办之要政太多，未完之要工太鉅，仓卒出疆，百为皆废”为由，拒绝了军机大臣瞿鸿禨的“白下之游”（调任江督的）提议，作为缓兵之计，“多则三年，少则一年以外，再图离鄂，均无可”^④。至光绪三十三年，恰好过了三年，北洋对南洋的权益侵占更甚，对于张之洞来说，又面临着抉择。此间已然不是出任江督这般简单，而是继承瞿鸿禨的“政治遗产”，既暗合慈禧太后制衡朝局的需要，也有其个人心仪所向的内在动力。诚如其幕僚许同莘在张氏年谱中所说，“丁未六月，传闻项城入军机，端忠敏督直隶，公调两江，已内定矣。公电致鹿文端云：鄂省十八年心力，抛于一旦，衰病侵寻岂能再创新居？惟有乞退而已。因即日具疏请假二十日。其隐辞两江而不辞枢府者”^⑤，表露了张之洞对参与机要的期许。

张之洞入京动因复杂，除了既有研究所认为的慈禧太后借此抑制袁世凯、平衡朝局的打算外，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徐锡麟刺杀恩铭的皖案骤然发生，这起偶发性事件引发朝野大范围有关满汉平权的讨论，张之洞入京与此不无关系。皖案发生后，朝野平满汉畛域、施行立宪的呼声日高。六月三十日，张之洞致电军机处，“仰恳圣明特颁谕旨，布告天下，化除满汉畛域，令内外各衙门议切实办法，迅速奏请核定施行”，坚信“此旨一颁人心自定，乱党莠民无可藉口，所有立宪议会等事俱以此为基址，自然推行无滞，其他各要政尽可详审斟酌，次第举行”^⑥。两天后，慈禧太后懿旨着内外各衙门各抒所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同日晚，张之洞奉电旨迅速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看来张之洞入都与皖案发生后棘手的满汉矛盾有关，熊希龄即认为，“南皮入都系电奏化满汉称旨”^⑦。鹿传霖称，“今日入对，上谕张某昨电奏融化满汉，若有未尽之词，即电飭来京面

①《端绪致端方电》，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同）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253-0026。

②《端绪致端方信函》，光绪二十九年，端方档案，档号：27-02-000-000009-0008。

③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0页。

④《余肇康致瞿鸿禨信》，中国历史研究院藏《瞿鸿禨朋僚书牒》第65封。

⑤许同莘编著：《张文襄公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206页。

⑥《致军机处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25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414页。

⑦《熊希龄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五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43-0088。丁未年平满汉畛域的讨论以及皖案的相关研究可参见：李细珠：《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安东强、姜帆：《丁未皖案与清末政局》，《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

询云，枢电计达，慈意甚殷”^①。平满汉畛域确系张之洞此次入京的动因，且具有偶然性，就在鹿传霖发电前一天还与张通电，称“艳电悉，边调无闻，或有人运动，以致谣传，当密探知并留意”^②。可见丁未年朝局调整风闻颇多，朝臣更动频繁，一些偶发事件在官员任命中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

内忧外患的清廷统治亟需政务能手，此年六七月间，日法协约、日俄协约、英俄协约相继签订，舆论轩然，御史史履晋两次上书，称协约名为尊重中国独立自主，实有协以谋我之情，有损中国主权，事机危迫，请飭议抵制之策。奉旨交外务部，令各地督抚共同筹画对策。^③七月初一日，张之洞致外务部长电，专论日、英、法、俄各国关系与时势形势及外交政策。^④据此，京中端府认为，“抱冰（张之洞）因协约电奏称旨内召”。^⑤无论是平满汉畛域，抑或是外交谈判，缓解内政外交压力，处理常政与新政的棘手问题，当政者除却权力分配与制衡的考量因素，遴选谙于政务、老成稳重的能臣为急务，张之洞为合适的人选。

丁未年中枢异动，权臣罢免，朝野自然不乏政局内幕的猜测，张之洞接到入京的电文同日，两广总督岑春煊去职。不免引发外界有关两件事情的联想，认为张为岑开缺的推手。这在维新党人的记述中被提及，在朝大臣档案中也有记载。

岑春煊被罢免后，康门弟子对此事多有议论，将岑的去职与张之洞的告发联系起来。维新党人何天柱给梁启超写信，谈及岑春煊被参一事说：“沪道（瑞澂）得端方电，到处访查。函丈（梁启超）此次来沪，虽无大碍，然西林（岑春煊）则为张所揭参，而吾党对于外人面子上甚不好看，凡所识者，皆来探问，于他事殊多不便。”^⑥何写信为六月十九日，称岑春煊被参为张之洞揭发应属误断，指的是御史陈庆桂参岑一案，实为端方暗中操纵。维新党人徐勤函告康有为：“岑之去，一由于庆王之排挤，二由于岑初特聘孺博（麦孟华）入四川，袁世凯、张之洞、梁鼎芬皆借此以陷之。……（陈赓虞、杨西岩）运动星海（梁鼎芬）嗾张之洞，借此电庆王以陷岑。张与梁与吾有宿仇，故又借以打吾党，以巴结庆王也。岑屡被参皆不动，参以勾引康党，则那拉动矣。于是开缺矣。”^⑦徐勤后来回忆还称，岑去职确与张之洞揭参有关：“值康先生有为自海外秘电某当道，请劾奕劻植党揽权，及外间有康梁秘联粤督岑春煊谋倒张之洞、袁世凯之谣，于是袁党力促张之洞奏请清后举发康梁乱政秘谋。”^⑧在维新党人看来，张之洞具有告发岑春煊的动机。据郑孝胥日记，熊希龄曾示其北京密电，云“南皮告邸：‘岑招康、梁至沪，谋不轨’等语”。^⑨

①《鹿中堂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三日，张之洞档案甲182-446。

②《鹿中堂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一、二日，张之洞档案甲182-446。

③《掌江苏道监察御史史履晋折》，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01-1084-005。《为陈抵制日法协约之管见事收两江总督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电报档，档号：2-05-12-033-0569。

④《致军机处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一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363—364页。

⑤《述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三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70-0012。

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3页。

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6—377页。

⑧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50—451页。

⑨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100页。

政潮期间，端方接庆亲王奕劻电报，嘱其调查岑春煊与康、梁秘密会晤一事^①，也提到了张之洞参与此案。端方曾暗中对奕劻的电报内容来源暗中调查，因与湖北按察使梁鼎芬交际深固，经常私信往来，致电向其打探：“沪上传言，抱冰（张之洞）有电致承泽（奕劻），云西林招康、梁至沪谋不轨，有此电否？祈密探示复”^②。梁鼎芬复电称已秘密探询电房，“复云无此电”。端方不甘心，称日后“查得此电，仍盼密示”。^③端方又致电在湖北的眼线朱文学询问，请其将“五月二十前后及六月初十边，抱冰有致邸（奕劻）及军机处密电，言西林结纳康、梁事，请将原码照转一阅”^④，朱回复称，“查从五月廿至（六月）十五日止，除因皖事致军机处、陆军部一电外，并无致处、邸之电”。^⑤端方深知康、梁与张之洞的恩怨，但对岑、张关系并不敢作出明确判断。

此后，端方给亲信蔡乃煌发过一封密电，谈及张之洞揭参岑春煊一事。电文如下：“又闻南皮（张之洞）近曾致书西林，辨明报载伊密参西林交通康、梁各节并无其事。并谓此等话语皆鄙人所谈，意在修好西林，归怨鄙人，用心殊不可测。务告邸与项城，万一与南皮谈及此事，千万加慎。南皮若以此事问公，尤不可涉及鄙人，致蹈机事不密之戒。要要。名。真。再公过于坦率，此等事关系重大，稍不留神，不但害成，且招奇祸，切戒戒。”^⑥密电没有标注时间，据电文抬头“北京番禺馆蔡伯浩观察”判断，蔡乃煌任邮传部左参议为光绪三十三年九月至三十四年二月，此封密电即在此一时段。电文载张之洞不承认揭参岑春煊一事，看来报界对此事也有议论，引起张的反击，认为是端方的构陷。这封电报反映出时人对揭参岑春煊结交康梁的幕后推手并不明确，难有定论，目前尚未发见张之洞揭发的证据。事实上，无论张之洞是否参与了去岑案，至少在端方的运作来看，就是让外界知晓张之洞入京与此不无关系，内在根源就在于端、张二人貌合神离，芥蒂很深。^⑦或许端方有意嫁祸于张，毕竟陷岑为其所为，借此传播谣言，转移注意力，掩人耳目，避免祸及己身。

二、有关入枢推手的猜测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军机大臣瞿鸿禨去职，清廷迟迟未公布继任人选，枢位久悬。按照军机处惯例，一般由亲王为首揆领衔，汉人军机多负责起草文书，此前瞿即充此角色多年。京内外汉重

① 参见张建斌：《端方与“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

② 《端方致梁鼎芬电》（无朝年，应是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十左右），端方档案，档号：27-03-000-000011-0031。

③ 《梁鼎芬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一日，端方档案，档号：27-03-000-000140-0095。《端方致梁鼎芬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三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54-0009。此电时间不详，据文内内容及“元”电推断。

④ 《端方致朱文学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24-0119-2。朱文学，字如山，任职武昌知县，双方往来密电本代号“余”。

⑤ 《朱文学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端方档案，档号：27-03-000-000141-0193。

⑥ 参见《端方致蔡乃煌电》，无朝年，端方档案，档号：27-02-000-000124-0020。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邮传部左参议着蔡乃煌补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3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8页。

⑦ 张、端关系见笔者《梁鼎芬丙午入京史事探赜》，《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03年第4期，第148—159页。

臣观望觊觎者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呼声尤高。此年五月张之洞以湖广总督授协办大学士，端方即曾预言“现在仁和（王文韶）予告，不日即当正位”。^①不出所料，六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张之洞着授大学士，仍留任湖广总督。^②诚如晚清御史胡思敬所言：“当时朝局，凡乘时窃取禄位者，皆非无因而至也”^③，推动张之洞入京之人，坊间存有不同说法。

盛宣怀坐探陶湘称张之洞入京出自慈禧太后之意。据其探查，慈禧与奕劻议论中枢人选，庆王先是提及岑春煊与袁世凯，太后“摇首”“默然”，提到张之洞则说“此人大可”，结果“即时延召”。^④张之洞在京坐探齐耀珊也认为，“探询此次召中堂入都，确系慈圣宸断，待中堂议定宪政，即留入政府，实非邸（奕劻）与亲贵暨借维新以图富贵诸人意也”^⑤。权臣参政机要必然是经过当政者默许的，只是在何场合？由谁提出？有不同的说法。

袁世凯告知端方，此事契机为内阁学士吴蔚若的奏疏，“吴郁生阁学请召南皮入备顾问，因而有调动议，但近来事话非宣示不能作定也”^⑥。吴确有奏陈，折中例举文祥、李鸿藻、沈桂芬等人皆负一时之望，指出张之洞“内政外交兼综”，建言召入京内办事，时备顾问，不过折中说是“入阁办事”。^⑦这封奏折应是吴所上《请整顿内阁为预备立宪之基折》的附片，原折讨论设立内阁的重要性，因此有在附片中推荐张之洞“入阁办事”一说，其所言内阁非传统内阁，而是指责任内阁。^⑧

端方在武昌的坐探冯少竹则透露了张之洞与京中的往来密电，提到了奕劻的作用。电文并未转述，未标明何人所发，笔者推测为鹿传霖，“京艳电曰：上意极注，枢论均属意尤□拳。京东电曰：邸谕维持大局非相（张之洞）莫属，万不能辞，转陈敬贺。复京东电曰：艳电各函正呈复间，接东电，相谕现在局面竞争，北上万非所宜，且精神难周，用度莫继，鄂简静熟悉，愿仍旧。近因病前月廿九专片请假，廿日期满仍续，务恳枢邸俯赐体恤，以全病躯云云，特闻”^⑨，电文揭示奕劻力挺张之洞入枢。端方将此电转发袁世凯，质疑“枢邸力援南皮入相”，询问是否有其事。^⑩袁回电未提及奕劻，但判断张入京难以推卸，“闻召南皮已定议，日内即发表，代者为次珊（赵尔

① 《端方致张之洞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14-0154。

② 此职应是此年五月王文韶因病开缺回籍空缺，瞿鸿禨去职所空协办大学士一职由鹿传霖补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3册，第112页。

③ 《三先生崇祀》，胡思敬：《国闻备乘》，第103页。

④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集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4页。

⑤ 《齐道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十、十一日，张之洞档案甲182-446。

⑥ 《袁世凯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72-0003。端方曾就此事询问京内坐探，“闻吴蔚若请召南皮入备顾问，内意如何？”未见复电。《端方致北京陶转正闇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廿八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60-0163。《致两江总督端方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6册，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69页。

⑦ 《内阁学士吴郁生附片》，光绪三十三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同）录副奏折，档号：03-5496-171。

⑧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吴郁生折》，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录副奏折，档号：03-5619-016。

⑨ 《冯少竹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72-0012。

⑩ 《端方致袁世凯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57-0039。

巽)”，指出此事已有定论，“恐未易辞”。^①

至七月下旬，张之洞迁延不肯赴京，鹿传霖致电询问，并告知“邸相屡问，似诧异，应将行期电奏或电枢”^②。看来奕劻一直关注张氏行程。鹿建议将行期告知奕劻或军机处，结果张之洞并未与奕劻联系，似乎不愿私下交际，而是直接发电枢垣，解释称“本拟二十日外即行，因鄂省酷热过甚，洞本病躯，又受暑热，致患腹疾，兼以眩晕，致今未愈，焦急万分，现正赶紧调治。又兼清理经手要政，昕夕不遑，昨日来炎暑稍减，无论如何本月内必当力疾起程，已备火车以待，万不敢稍有耽延”^③。

此外，朝野还有袁世凯、鹿传霖助力等多种说法。端方之弟端绪探称，“南皮内召闻项城主之，甚奇”。也有称，“枢位久悬，定兴（鹿传霖）拟请冰代”。^④关于召张之洞入京的提议众说纷纭，正是朝局动荡的反映，也无疑加速了各方的谋划。据称，鹿传霖“前保四人，项城外，戴（鸿慈）、杨（士骧）及苏抚（陈夔龙）上意皆不属，现无准信”^⑤。端方曾向在京的赵尔巽询问，“传闻中外各员将大有更动，究系如何调动，乞密示”^⑥，未见回复。朝野内外都在关注枢垣的变动，猜疑推测难免。综合来看，清廷就枢要人选有过讨论，奕劻推举张之洞非其本意，而是在迎合慈禧太后的心意。

三、迟不入京的各种因由

七月初二日，张之洞内召的上谕下发，催促其尽快入京参政机要之人众多。在京的鹿传霖得知谕旨后，立即致电，称“似宜速来”。七月初五日，鹿又建言，“早来为要”。过了近二十天，鹿不见张之洞行程，又去电询问，“有谓庆寿后始行，太迟不相宜，最好到京称觴，万望速来”。^⑦此外，京内外不乏敦请之人，七月初九日，浙江巡抚张曾敫致电称，“长者内召出慈意，天心开悟，可望转危为安……望速行以免若辈沮尼”。^⑧七月十七日，湖北在京密探吴太守来电，称有电旨召袁世凯“摒挡一切，迅速来京，预备召见”，催促张氏“从速来京”。^⑨端方判断“朝局如此更动，冰入都之意必有游移”^⑩。促成张之洞游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陶湘认为，“曲江（张之洞）之观望，一则实在湖北事不便遽易生手；二则恐入内不能作骑墙之举动”^⑪，所言颇能反映政情。张之洞盘踞湖广多年，作为其进京的基地后援，需要安排可靠人

① 《致两江总督端方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6册，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三日，第394页。

② 《鹿中堂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廿、廿二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25册，第432页。

③ 《致军机处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25册，第430页。

④ 《述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八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70-0013。

⑤ 《述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八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70-0013。

⑥ 《端方致赵尔巽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54-0001。

⑦ 《鹿中堂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日、七月初五日、七月二十三日，张之洞档案甲182-446。

⑧ 《杭州张抚台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九、初十日，张之洞档案甲182-446。

⑨ 《京吴太守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张之洞档案甲182-446。

⑩ 《端方致梁鼎芬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25-0016。

⑪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集之一》，第65页。

选接任，“不便遽易生手”。鹿传霖建议，“如举不避亲，浙抚（张曾敫）当可遵守成规，请密筹备”，未被张之洞采纳。^①张之洞保举外务部尚书吕海寰接任，清廷未同意。迁延不暇，湖广事务由藩司护理。但张之洞还是对湖广的人事做了一番调整，查阅内召上谕后张之洞一整月的奏疏，一些人员的奖罚提上日程，多有职务调动，这既出于政治需要，也是人情世故。七月二十七日，清廷宣布张之洞和袁世凯入枢，次日，任命赵尔巽署理湖广总督，直隶总督由北洋系山东巡抚杨士骧调任。据此，陶湘评论“曲江手段远不如雪公（袁世凯）”^②，指的是在接任人选的选择上袁更胜一筹。

影响行期的关键还在于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陶湘的分析与张之洞在京坐探齐耀珊基本一致，认为入京后恐陷入两难，“中堂留京，势难与邸（奕劻）浹洽，或不免为亲贵所挤，为假借维新诸人所嫉。意见既存，沮挠不免，恐于国事无济，于中堂亦诸多不宜。若中堂援举北洋，既合邸意，且又系当世之人才，北洋入，中堂出矣，邸与北洋既得，中堂此后办事必少扞格，但于国事有益”^③。在齐耀珊看来，与袁世凯、奕劻产生隔阂难免，如果违背己愿，推北洋则合奕劻意，此后办事少掣肘，于国事有利，结局则是“北洋入，中堂出”，枢垣重地，袁、张难于兼容，张有出枢危机。坊间传言慈禧密谕奕劻，媒合袁、张结亲，“以弥前隙，俾得共济时艰”，寄望张、袁和衷，看来“项城与南皮向日略有意见，太后亦微有所闻”在当时是街谈巷议的话题。^④

除了面对北洋集团，京内人际网络错综，历来外官入朝难以应付，张之洞此前入京亦深受其苦，“南皮素以留内为苦”^⑤。内阁、资政院、国会、地方自治这些新政的敏感内容尚须做足功课，派遣得力人手与各方相商，征询意见。端方支持张之洞先开国会、后布宪法的主张，是否出于真心不得而知，称“我公政见诏宜先开国会后布宪法，若先立内阁以一人为总理大臣，而无国会为之监督，则是变君主专制之政体为内阁专制之政体，其弊更大。”“尽虑精深，莫名钦佩”。指出地方自治为开设议会的前提，“无地方议会则自治之规模不能成立，国会之性质不能完全，未有宪法之基础，即令宣明立宪，亦不过徒托空文，罕有实际，且恐行政大权萃于一人之手，徒酿党派纷争之祸，而无上下相维之效”。^⑥岑春煊致电询问内召“大政大议”，未得张氏正面回复，反向岑求教。岑春煊复电称立宪为救亡第一要策，“主众谋不主私议，主急于实行不主缓而敷衍，其要尤在用人辨邪正、明是非、信赏必罚”^⑦。“主众谋不主私议”应是表达对上年袁世凯把持中央官制改革的不满，所主张的立宪速行与荣庆、铁良意见相左，两人均“不以速行立宪为然”。^⑧

此外，朝中满族权贵的态度也为张之洞重要关注点。在京坐探邹履和探得肃亲王善耆和陆军部尚书铁良的一些言论，对张之洞颇为有利。据称，善耆曾言：“此次相召，首在筹议革命党事

①《鹿中堂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十日，张之洞档案甲182-446。

②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集之一》，第65页。

③《齐道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十、十一日，张之洞档案甲182-446。

④《太后密谕庆邸为袁张作伐之苦心》，《广益丛报》1907年第153期，第1页。

⑤《端方致袁世凯电》，光绪三十三年，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56-0025。

⑥《端方致张之洞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端方档案，档号：27-03-000-000140-0285。

⑦《岑宫保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四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110册，第455页；《致上海岑宫保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52册，第673页；《岑宫保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九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110册，第492页。

⑧《荣铁不以速行立宪为然》，《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1907年8月20日），第3版。

件，次则满汉畛域，次则立宪。如内阁是题中命脉，立储为关系重大题目，项、（载）振虽似有密议，断不敢孟浪倡议。闻召镜宇（吕海寰）有出外部，袁有入外部之说，恐袭庚子大阿哥事牵动全局，以袁应付各国公使，亦未可知。总之，中堂（张之洞）早来一日，则大局早定一日，某某秘计亦可暗中隐销无数；若再观望徘徊，坐失事机，不惟大损向日威望，亦殊负此次两圣特召入都之至意。”^①“某某密计”应代指袁世凯所行之事。

邹履和还报告张之洞，说铁良曾称：“都中士大夫靡不引领南望，中堂若早来，则某某秘计早已瓦解；迟迟其行，始有今日。然中堂此行出自圣意，袁之不入不惟非上意，但非邸意。邸父子近来颇不相洽，（载）振、杨（士琦）交结，邸颇不以为然。良以为中堂不可因袁入，遽怀观望；当立即启节，以慰天下之望，以报两圣之知。总之，愈速愈佳，怠迟则某某布置亦有端倪，对待又当煞费苦心，良若有所知中堂来京下向，必尽情相告无隐等”。^②铁良希望张之洞早日入京，目的即为制衡袁世凯。满洲权贵也有对张之洞不满者，“新内阁总理一席张中堂颇有可望，惟泽公（载泽）不以为然，力保袁慰帅充任”^③。

地方大员进京，佐役幕僚众多，京中安顿也影响到张之洞的行程，居所是亟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入朝方便，官员一般住在紫禁城附近，但寻找一处能够容纳多人的住所并非易事。自电召入京后，张之洞即派人谋置居处，意向为此前入京居住的先哲祠，令在京杂役清理修葺待用。因随带人多，恐屋少不敷住，又询问北学堂之东新园大空院新造北厅以及全浙会馆可否借用，以备委员居住。京法部大理院公所（原工部公所）离宫门较近，张之洞三年前入京曾借住数月，颇有感情，为此与法部尚书戴鸿慈协商。因慈禧太后常住颐和园，为了进园脚程便捷，又电在京覲见的梁鼎芬寻觅附近宅院，以备赴园之用。^④

从以上安排来看，张之洞对于此次进京格外重视，似作了长久居住的打算。住所安排后，令在京衙役沟通电报局，不料加装电报引起了两江总督端方的嫉妒不满，致电上海电报局称，“去年鄙人回京复命，曾托另设电局未荷应允，而许以到京后派马四匹、人四名专司送电。嗣后马未派来，人亦不能如数，想必其中实有为难，故未深求。近闻张中堂此次晋京特设电局至三处之多，均已照办云云。鄙意以为此说必系谣传，若是真，足下办事不应先后显分轩轻”^⑤。这件插曲也反映出端、张的隔阂，端方并非真正介怀电报局的轻视，此举的目的还在于谋求张之洞入住其在京宅院，以便于接近。

端方叔父为内务府大臣桂清，家境殷实，在京产业多，由端方继承家业，瞿鸿禨、林绍年等重臣入京均租住端府部分宅院。瞿鸿禨去职后，端方将其宅典回，告知家人，“吾房乃宾从所居，万勿因吾房而扰散全局”^⑥，拟用此宅招待贵客。张之洞进京后，端绪立即拜见，提出借其新宅，

①《京邹道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张之洞档案甲182-446。

②《京邹道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廿四、五日，张之洞档案甲182-446。

③《电一》，《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1907年8月19日），第3版。

④以上引用有关京内住所的电文见《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52、110册。

⑤《端方致上海唐露园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041-0144、27-01-001-000116-0162。

⑥《端方致北京陶译交吏部弼泽卿电》，[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一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59-0065。

并建议如不敷用，尚有瞿鸿禨新造洋房可合用。^①如此宅不行，又推荐端府对门爽良宅。^②端方表面上关心张之洞的居所，实为便于打探政情的考量。此间两江在京提塘裁撤，成立文报局，即移设在端府，易于在两江遥控。^③

京中租赁住宅、整修房屋、安装电报提上日程，张之洞却未急于起程，而是继续观察朝中动向，尤其心心念念的枢要之位尚未公布，不得安枕。七月初四京中密探称，“军机未放人，金谓慈圣眷注中堂也”。同日，天津坐探来电，“上意拟中堂入枢，恐难辞”。几天后，鹿传霖来电称，“今探询世相，慈圣微露召公入枢意”^④。这些捕风捉影的猜测，时刻波动张氏心弦，可未见上谕，一切都有变数，继续等待。七月二十七日，上谕袁世凯任外务部尚书补授军机大臣，张之洞以大学士补授军机大臣。中枢调整落定，由此引发连锁效应，七月二十八日，湖广总督由四川总督赵尔巽署理，所留空缺由苏抚陈夔龙继任，张曾敫调补江苏巡抚，冯汝骥补授浙江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山东巡抚杨士骧继任，吴廷斌署理山东巡抚。加之七月初两广总督、河南巡抚分别由张人骏、林绍年补授，丁未政潮爆发后朝局调整基本告一段落。八月初二日，新任军机大臣、大学士张之洞携幕府家眷渡江，初三乘火车启节北上，初五日下午至京，住先哲祠。

四、入枢初期的张之洞与朝局

张之洞尚未入京，京中坐探已对其初入京城举措有所建言，“此时最宜留意者，惟初次召对及接见各大老，万无遽发行政见及办法，总宜少说，先谋后断”，并与袁世凯做了一番比较，“以为中堂构思精审，文章口负时望，袁远不及。然袁办事敏捷，似在中堂之上，不可不知。将来谋定勿转告人，总以力争先着为主”^⑤。看来张府上下早将袁世凯及北洋一系视为竞争对手。果然，张之洞入军机后，极难应付的当属处理与奕劻、袁世凯的关系，再难做骑墙之举，尤其体现在立宪政策层面。

组织内阁为时人关注的焦点，报界对新内阁的组成不乏猜测，有人认为“闻内阁成立后，鹿传霖、林绍年、世续三人均须退出枢府”。^⑥也有报道称张之洞此次入京因议设新内阁，新内阁业已决定，久未公布，实因内阁总理大臣一职某邸与某中堂有逐鹿之意。^⑦也有认为新内阁总理一席为张之洞，惟载泽不以为然，力保袁世凯充任。^⑧此年袁氏条陈十策，重提责任内阁制，以各部长官为政务大臣，奕劻担任总理大臣，“以资表率”，副总理一人，“系自为设”。^⑨张之洞建议先开议

① 《端方致张之洞电》，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042-0134、27-01-001-000117-0187。

② 《端方致张之洞电》，[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59-0061。

③ 《端方致北京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六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60-0144。

④ 《京齐道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四、五日，张之洞档案甲182-446；《天津张委员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四、五日，张之洞档案甲182-446；《鹿中堂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十日，张之洞档案甲182-446。

⑤ 《京邹道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廿四、五日，张之洞档案甲182-446。

⑥ 《电二》，《申报》1907年8月7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廿九日），第3版。

⑦ 《新内阁制度未发表之原因》，《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八日（1907年8月16日），第3版。

⑧ 《电一》，《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1907年8月19日），第3版。

⑨ 《京齐道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张之洞档案甲182-479。

院，召开国会，监督内阁，“南皮到京后即对雪公（袁世凯）云：‘下议院急宜先设。’雪云：‘似乎太早。’南皮唯唯”。^①报界则将政见不同视为道不同不相为谋，在张氏入京之前即预测“此次政府电召香帅进京参议立宪事宜，一时官场中人议论纷如，以为香帅宗旨向与袁督不合，袁督主急进，香帅主渐进。若召香帅晋京，举朝各官恐不免分为二党，然宪政之基础未立，政党之门户先分”^②，并预见新内阁“组织即未成功，而政界之风潮已烈”，清廷面临的是改革与政争的双重困局，“多变一法即多一争端，多生一事即多一抵抗”。^③

张、袁世凯政见不同，不能和衷早为外界揭晓，端方称“张、袁不协，殊为大局忧”，实言不由衷，乐见此局面。^④蔡乃煌与庆王府多有走动，称“张、袁意见恐难全化……，并有人劝张起用岑春煊以抵袁”。^⑤陶湘称“宗旨各别，非常猜忌”。^⑥张、袁关系如何？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的得力幕僚梁鼎芬分别于当年七月和九月连续两次参劾奕劻与袁世凯，正处于张入京前后两个时间段，张对两次弹劾态度之变化间接反映了他对北洋和朝局的认识。^⑦

梁鼎芬作为张之洞深得信赖之人，发难弹劾庆王及北洋，引起同在枢垣奕劻的不满，“邸于未到之前见报中梁折，颇有闲言，谓冰与我交多年，不合当规劝，不应如此”，^⑧显然奕劻认为梁鼎芬弹劾出于张之洞授意，颇有烦言。揆诸史实，梁第二次弹劾的言辞是非常激烈的，三件附片直指死对头奕、袁。第一片弹劾袁世凯北洋一系。其中首举徐世昌“本袁世凯私人，又夤缘奕劻、载振父子，得此大官大权，我皇太后皇上或未尽知之”。且“杨士骧、陈夔龙等，以贪邪小人，各任兼圻”。此外如梁如浩放上海道，蔡绍基放津海关道，刘燕翼放镇江道，政以贿成，纲纪荡然，“恐自是以后，人人皆知有奕劻、袁世凯，不知有我皇太后、皇上矣！”“奕劻、袁世凯贪私负我大清国至此已极”。此片重点讲述奕、袁结党营私，侵夺君权。

第二片称袁世凯掌兵权乃不祥之兆。此片多是道听途说，称光绪三十一年秋操，袁世凯阅兵时，“以龙旗前导，道路不许人行，与警蹕相同，人人皆以为异”，影射袁氏僭越礼法。且同行的铁良“甚畏袁世凯，不敢发一言”，以此渲染袁之跋扈。又借天象佐证，“及观兵日，袁世凯到时，天忽大风，沙尘四飞，白昼对面不见人，兵不成礼，各省所派文武各官随同观阅者，往往人马相失，如在黑夜无烛而行惊恐分散，不成景象，甚至有匿于丛冢者，到晚风始息”，指出“袁世凯不能观一兵，人人皆以为异”，感叹“天佑我大清，故以风示儆，使人臣知惧，不敢有他，此事通国皆知”，向两宫进言，“惟袁世凯权力甚大，恐无人敢于上闻者”，指明袁偷窥神器的不臣之心。^⑨

第三片指出袁世凯不应在北洋为官。梁鼎芬引用慈禧太后深为倚重的军机大臣荣禄临终遗言，

①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集之一》，第69页。

②《京事小言》，《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1907年8月19日），第3版。

③《明揭力争新内阁总理大臣之三大罪》，《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九日（1907年8月17日），第3版。有关地方督抚对立宪认识的研究，参见李振武：《预备立宪时期督抚对立宪的认识及态度》，《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④《端方致北京陶电》，[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四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59-0039。

⑤《蔡乃煌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廿六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64-0022。

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集之一》，第69页。

⑦相关研究参见马忠文：《丁未政潮后梁鼎芬参劾奕劻、袁世凯史实考订》，《历史教学》2014年第20期。

⑧《孙廷林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70-0059。

⑨吴天任编：《梁鼎芬先生年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28页。朱批、录副未见此折。

称其病重时告亲信说,“袁世凯不宜在北洋,须奏明皇太后、皇上,此事极要,今病重不能奏矣。荣禄盖深知袁世凯不可测,故谓不宜在北洋,嫌其近京也。北洋尚嫌近,况在政府乎。荣禄尚有驾驭袁世凯之才,奕劻能之乎?兹事关系极大”。^①梁鼎芬排挤袁世凯的策略为不能“近京”,与奕、袁将政敌岑春煊排挤出京如出一辙。

梁第一次弹劾,张之洞尚未入京,相隔千里,尚免于直面的尴尬。几个月后,张之洞入枢,梁鼎芬再次对北洋发难,则是另一番局面。事实上张之洞对梁第二次弹劾并未知情,得知此事后认为不妥,“发折后公(张之洞)始闻之,太息不已,以朝局机阻,鄂吏不宜为此言也”。^②发电给湖北学政黄绍箕,令其劝梁鼎芬“不可再行,恐疑鄙人为授意”。指出慈禧太后对于此事“至于泣下”,“日前折上,慈圣甚怒,谓为搅局,经鄙人极力解说,乃已”。在慈禧看来,“政府纷扰,外人益将生心,深恐朝局扰乱,致于大局有碍”,显然批评梁也是指摘张。张告诫梁,“似此毫无益处,徒伤圣怀,为臣子者于心何安?以后万万不可如此”。张、袁入枢后,当政者更愿看到制衡的局面,但不想扰乱朝政,且张之洞“入枢以来,相机斡旋,似觉补救不少”。有此事件,“此后形迹益深”“殊难措手矣”。^③由此看来张之洞入枢后,竭力与枢垣中人斡旋,却处境尴尬,无怪乎感叹“难在京久住”。^④

有关张之洞初入京城的处境,时道员孙廷林在京,他与张之洞、端方均极为熟悉,所发的一些电文颇能反映实情:

连日密探冰与邸、袁交情,袁则外联络,内颇敷衍,并与冰觅一宅,未往也。邸于未到之前见报中梁折,颇有闲言,谓冰与我交多年,不合当规劝,不应如此,后经旁人说开,到京时并派振贝子望谒,冰初挡驾,二次请进。振执弟子礼甚恭,振子有望储消息,故竭力弥缝。于一切权要均邸主之,大概邸与世(续)交最密,袁佐之,遇事商定后与冰一谈而已。邸与宁事不甚关切,年底非多送炭敬不可,藉博其欢。冰日前告袁,谓若改坐论尚可支撑,倘照此久跪,有半年老命必休,意在探袁口气耳。惟派管学部,必须将章程议有端倪,恐非三五月所能竣事。菊帅(徐世昌)因交涉案自请入都,别无新政。^⑤

电文中称张之洞初入京城,袁世凯为其觅一宅示好,结果被拒。袁则对外称张“眷顾并不隆,不过取其清望,聊镇人心。刻下扰乱已甚,大约再有一两月,可以大定矣”。^⑥奕劻不满于梁鼎芬对其弹劾,后经人说开,派载振执弟子礼觐见张之洞,缓和僵局。载振之子有储君之望,对张极为谦恭。军机处权要由奕劻把持,且与世续关系最密,“世相为之缓颊,而庆之贪横得与国同休。

①《奏为已故大学士荣禄病重时告知袁世凯不宜在北洋请留神监察事》,无时间、责任人,朱批奏折,档号:04-01-01-1082-047。吴天任编《梁鼎芬先生年谱》收入此片,第229页。

②吴天任:《梁鼎芬先生年谱》,第229页。

③《朱文学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三、四日,端方档案,档号:27-03-000-000011-0013。

④《孙廷林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70-0066。

⑤《孙廷林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70-0059。孙发此电前接到端方密信,嘱托“抱冰近日议论如何,有何建白,与邸、袁意见合否,何人与冰往还最密,均电示”。见《端方致孙廷林电》,〔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六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59-0045。

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集之一》,第68页。

其他大政因之迁延不举者，不可胜举”。^①袁遇事与庆王商定后，再与张之洞商讨，“目中已不畏南皮，委蛇而已”^②。“阳以礼貌尊事之洞，推为老辈。凡朝廷不甚经意视为迂阔可缓之事，……悉让之洞主政”。^③张称久跪身体不适，实际反映出在京窘境，但因主管学部，章程未定，一时难以脱身。

调整后的军机处其他要员中袁世凯以外部尚书入枢垣，世续、张之洞以大学士入，各有本官，唯独鹿传霖似缺非缺、似差非差，其在军机处境亦可联想。且与张之洞关系微妙，“传霖与张之洞为姻党。之洞督鄂时，尝侦察内情以告，遇事辄袒护之。及两人同值枢庭，情意反不相洽”。^④报界称载沣自入军机，颇能留心政务，召见时于条陈事件能应答如流，两宫甚为嘉悦，并谕其专心政务，未来朝廷所倚。^⑤奕劻与载沣原有成见，自载沣查办段芝贵参案后，大动感情、顿弭前隙，凡军机处一切要政，每事必商之而后裁决。曾谓世续：“我已老朽，行将告退，今醇王爷干练有才，不患继任无人矣。”^⑥当然不是由衷之言，但却是当政者乐于见到的局面。只不过这种调整的结果是汉臣互相制衡，满人权力得到进一步强化，“事无巨细，均由慈圣主持，诸臣但唯唯承旨而已”。^⑦

光绪三十三年发生的丁未政潮是统治集团内部纷争的一次集体爆发，慈禧太后借机整理朝政，张之洞入枢即为其中重要举措，影响了清廷最后几年朝局。在丁未政局调整肯綮环节猝然发生的皖案，使得原本就芥蒂益深的满汉关系更加紧张，这应是促成张氏入京的重要因由。由外官进入枢要的台前幕后不乏猜测与风闻，为朝政废衍之际的常见现象，折射出时人对政局的认识，作为当事者不免游移与观望。军机处虽为集体决策，依然有重心存在，当政者为加强集权折衷各方，却导致了离心倾向。各方共治难，由满人独治更难，正如浙江巡抚张曾敫在张之洞入京前致电所言，“慈意长者（张之洞）与项城同入枢，此说甚确等语。窃意果如所言，原不尽满人意。然长者即日入都而陈大计，天心专注亦未可知，否则同秉政权，亦不致举天下事，尽操于若辈之手”。^⑧张之洞入枢为缓解统治危局的策略，却不是解决体制问题的最终出路，总之平衡朝局断难办到，所作《读宋史》一诗道出其参与机要的窘境，“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警杜鹃。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寒日到虞渊”。^⑨

[责任编辑 李振武]

① 《世续纵庆亲王作恶》，刘体智：《异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22页。

② 《袁世凯罢黜始末》，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第509页。

③ 《孝钦驾馭庆邸》，胡思敬：《国闻备乘》，第112页。

④ 《鹿传霖暗中主复科举》，胡思敬：《国闻备乘》，第114页。

⑤ 《日下近闻》，《申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六日（1907年7月15日），第4版。

⑥ 《日下近闻》，《申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八日（1907年7月17日），第3版。

⑦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91页。

⑧ 《杭州张抚台来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廿一、廿二日，张之洞档案甲182-446。

⑨ 赵寿强校注：《张之洞诗稿详注》（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10页。